

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何以可能

——基于新疆阿克苏市电商产业发展的案例分析

徐旭初^{1,2} 郭惠鑫¹ 吴彬^{1*}

(1.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法学院,杭州 310018;2.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杭州 310058)

摘要: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是解决我国区域性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手段。基于杭州帮扶阿克苏市乡村电商产业发展案例,在行动者网络理论基础上构建跨边界发展网络框架,以探索数字经济环境下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的实践逻辑表现为跨边界发展网络的构建,即通过主体融合、虚实融合、产业融合、点面融合的方式,打破组织边界、物理边界、产业边界和地理边界的束缚,实现施援方与受援方的良性互补,进而促进当地优势产业发展。

关键词: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跨边界发展网络;乡村电商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24)05-0071-13

一、引言

长期以来,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地缘条件等方面的广泛差异,区域经济发展往往呈现出显著的不平衡性^[1]。受制于薄弱的产业基础、落后的市场化水平、不便的交通条件以及人口流失导致的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于东部地区。因此,如何实现东西部协调、协同及共同发展成为解决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和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以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为援助核心,以解决边境地区和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首要目标的对口支援制度。1986年,中央提出,对口支援不仅包括资金、物资支援,还包括人才、技术、信息、管理、劳动、产品支援等^[2],这意味着对口支援向更全面的领域拓展。基于对口支援的实践经验,1996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自此,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制度^①逐渐成为解决我国东西部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制度。无疑,在此制度实施中,施援方与受援方之间的互动和契合是帮扶协作得以有效实行的重要基础。面对施援方提供的发展机遇、资源要素以及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机制,受援方如何基于自身要素性状实现有效承接和科学

收稿日期:2023-10-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加快数字乡村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研究”(21ZDA031);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专项课题“农业强国建设背景下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机理、路径与对策研究”(浙社科办[2023]27号)

作者简介:徐旭初,男,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法学院、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郭惠鑫,男,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硕士生;吴彬(通信作者),男,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①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均为中央针对西部欠发达地区、贫困地区做出的加快扶贫开发进程和乡村振兴的重大决策,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且日益有融合统一的趋势。在过往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对二者不做区分,或者统称扶贫协作、对口支援、对口帮扶等,抑或组合称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

配置,从而实现共赢协进,就成为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在新时期面临的重要议题^[3]。

一般而言,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的过程,是处在政治行政体系下的资源转移过程,无论是条条结对、块块结对^[4],抑或是条块结对^[5],其结对关系表面上是施援方和受援方的双方帮扶协作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以政府为节点的“施援方-政府-受援方”三方委托代理关系,以政府为节点的结对网络实现对政府、市场与资源之间跨层级、跨区域、跨行业的有效整合和互动配置^[6]。一方面,施受双方通过优质资源的对接配置,实现要素的精准匹配和有效投入,基于主客体、协作要素、对接方式的多维差异形成多样化的产业扶贫协作模式^[3],从而实现由施援方向受援方的产业与技术的转移与创新^[7]。另一方面,施受双方间的协作互动,有效带动当地小微企业参与建设,实现对受援方的人才建设、交通建设、资源调配、产业扶持的多方面带动作用,并反馈、促进施援方进一步发展,以此实现结对双方的高效协作。

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实际上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依靠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中央政府主导下直接促成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提供经济、技术和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支持,以加速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乡村产业发展);另一种则是在行政体系引领下,基于东西部地区自愿互利的原则所进行的扶贫协作过程。前者是一种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横向转移支付”^[8],是在中央政府主导下地方政府间的政治性馈赠^[9],这种模式弱化了新阶段施受双方协作互助的治理机制特征。换言之,尽管前者实现了资源的精准、高效再分配,然而帮扶活动由国家作为中介,导致施受双方的地方政府之间难以建立稳定的双边关系,援助绩效也难以得到直接反馈,限制了两地更深层面的合作。而后者通过建立明确的双边关系,为施受双方的相互了解与优势互补提供了信息沟通的基础,为施援方深入了解受援方的地方实际与具体需求建构了稳定关系,从而也为持续性的协作关系夯实了基础^[1],由此,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得以超越东西部地方政府间的协作,将区域延伸至市场、社会的协作之中,进而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发力、社会参与的多元格局^[2]。

目前关于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的研究虽已具有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但对于施受双方在协作过程中的匹配和互动仍缺乏较为翔实的微观分析,也鲜有研究聚焦帮扶协作对两地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以及所涉不同主体间的具体联系过程与内在机制。有鉴于此,本文着眼于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过程中施受双方多元行动者之间的联系和互动过程,尝试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视角,以杭州帮扶阿克苏市电商产业发展为案例,探索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何以可能的内在机理,并提出基于跨边界发展网络的创新性解释。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 行动者网络理论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源于20世纪80年代,是由法国社会学家Miche Callon和Bruno Latour等学者提出并加以完善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10-11]。ANT给予非人类因素以关键地位,重新联结人们在自然和社会之间所制造的分野,其基本取向是认为科学是一个人类和非人类两者相互作用的场域。ANT也被称为“转译社会学”,其核心概念包括行动者、异质性网络和转译、强制通行点。其中,“行动者”可以是人类行动者,也可以是非人类行动者。这些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不确定,每一个行动者作为一个结点,编织成一个无缝之网。异质性网络“转译”是行动者网络理论最为关键的内容,其过程包括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和异议等内容,而强制通行点则是一个“行动者网络”得以稳定的关键,与之联结的其他行动者可以依据自身条件转化为行动意愿^[12]。

因此,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探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制度,可以从微观层面上考察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中的内在联系,明晰不同主体间的关联性,进一步突出非人类因素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性,进而基于乡村产业发展中不同相关主体的内在联系,通过“强制通行点”,构建一个可以有效解释和解决不同主体所面临不同问题的关系网络,实现区域产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为宏观层面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提供可行经验。

(二) 跨边界发展网络分析框架

行动者网络重视异质行动者的联结作用,基于异质行动者的转译来解释具体现象,与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助推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研究具有高度的适配性,即通过对行动者网络的构筑与转译,可以厘清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不同阶段中不同行动者的不同作用,进而阐释通过西部乡村产业发展实现东西部协同发展的动力机制。过往的行动者网络研究中,更注重不同行动者的作用,而忽视了其边界性,但如卡莉^[13]所言,语义和务实边界的出现抑制了不同行动者之间的知识共享与合作。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农户、企业、政府受制于不同的文化、制度与环境,其合作本身就受到包括组织边界在内的多元边界的“隔绝”,“隔绝”因素不消除或者弱化,合作难免流于形式^[14],为了对东西部协作助推西部乡村产业发展做出具象化的理论解释,引入“边界跨越”这一概念。知识理论视角认为,组织边界的确定取决于其所拥有的知识,知识的异质性、价值共赢、竞争优势等能够很好地诠释组织边界^[15-16]。在数字经济时代,知识在不同数据源中呈碎片化分布,知识的动态交互能够连接各个数据源,关联、整合碎片化知识并共享价值^[17-18],从而构建一个价值共生的数字化生态,进而表现为一种边界重构与跨越的过程。数字化转型下,边界重构是不同知识体拥有知识的整合、创造和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行动者所代表的知识体,与整合后的新知识以及相关产物,作为边界跨越者和边界跨越载体^①,实现了对包括组织边界在内的原有多维边界的跨越。本文构建的东西部协作“跨边界发展网络”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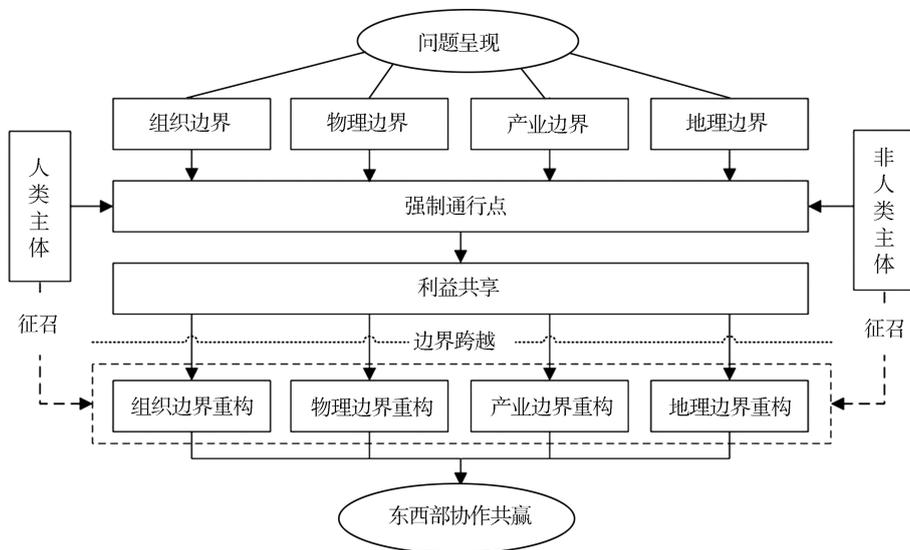


图1 东西部协作“跨边界发展网络”分析框架

通过对杭州帮扶助推阿克苏市电商产业发展的案例分析,基于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过程中对组织边界、物理边界、产业边界以及地理边界的跨越及重构,进一步分析东西部协作和

① 所谓边界跨越者即推动边界跨越行为的主体,它可以是指定的或者非指定的个人或组织,而边界跨越载体则是可以被用来推动跨越行为的客体。

对口支援背景下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中不同主体的协同作用,以期帮助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有效摆脱过往边界“隔绝”难题,从而加深产业发展中不同主体间的联结深度,提升产业发展效率和可持续性。本文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础上,借鉴“边界跨越”概念,构建了一个跨边界发展网络的分析框架,以体现宏观跨区域资源调配下微观主体间的内在关系对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发展的促进作用。

三、行动者网络视域下阿克苏市电商产业发展的演进过程

阿克苏市是新疆阿克苏地区七县二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气候宜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水源丰富、光照充足、无霜期长,适宜各类农作物生长。自2014年阿克苏市与杭州市建立协作关系、大力发展电商产业至今,阿克苏市充分发挥自身的自然条件优势,基于杭州提供的人才、技术、市场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支持,有效拓宽农产品市场销售,带动当地产业发展及人才创业就业,成功实现了资源的跨区域调配,有效缓解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笔者团队对阿克苏市电商产业发展进行了长期的跟进研究,并于2022年底受杭州援疆指挥部邀请,前往阿克苏市展开多次调研,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并通过阿克苏市相关政府机构以及网络途径搜集了阿克苏电商产业发展相关数据及政策文件。

(一) 阿克苏市电商发展的基本演进过程

从2014年起,杭州援疆指挥部利用杭州“电商之都”的优势,帮助阿克苏市发展电商产业,从人员培训到组建电商协会,再到构建产业链,阿克苏市电商产业在8年间从无到有,经历了电商发展1.0阶段向3.0阶段的转变。通过梳理阿克苏市电商产业发展历程可知,阿克苏市较早便意识到产业集群以及人才培养对于电商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其通过构建电商产业园的路径,培养和聚集电商从业者以实现产业集群化发展。2014年,阿克苏市开启首期电子商务培训班,着手培养电子商务专项人才。2015年起,阿克苏市加强与杭州市援疆指挥部合作,引入阿里巴巴商学院,建成阿克苏电商产业园。同年9月,阿克苏市建设完成首批28个村级电商服务站,打通农村商贸流通最后一公里,逐步建设和完善了农村村级电商服务站网络。2016年,阿克苏市人才培养初见成效,首批23名本土电商讲师获得工信部认证,并有效带动了就业和产业发展。进而,阿克苏市将发展目光看向产业聚集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与此同时,品控标准不统一、生产加工工艺跟不上需求、品牌影响力不大、市场发展受到限制等销售端问题逐步显露,成为阿克苏市电商产业发展的瓶颈。2017年,阿克苏市发起成立阿克苏市电商协会,以整合电商发展资源要素,凝聚产业合力,并以协会名义注册阿克苏电商公共品牌“冰糖红”。2018年,阿克苏建立新疆首个“未来农场”,在种植端、质保端、产品设计端、物流端、销售终端实现进一步的产业升级。同时,电商协会与顺丰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通过整合物流要素,电商企业由当地发货逐步向异地建仓拓展,提高了电商物流效率。2019年,阿克苏市电商产业新园区正式启用,成为南疆首个集商务合作、创业创新、教育培训,仓储物流等功能为一体的专业化园区。

此后,阿克苏市进一步巩固电商产业发展成果,加强与阿里巴巴等龙头企业的合作。2021年,阿克苏市与杭州援疆指挥部共同商定,启动新的“2.0版”电商产业园建设,开展新阶段的阶梯性培训。通过梯次开展“天山计划”“蒲公英计划”“领航员计划”“追梦计划”四期培训,合力培育本地电商人才。无疑,电商产业园的出现实现了阿克苏市电子商务产业从无到有的跨越。截至2021年底,电商产业园入驻电商企业85家,顺丰、京东等物流企业16家,解决就业近2000人;孵化电商企业225家428人,电商零售额从2014年的4亿元发展到

2021年的25亿元;农产品销售额从2014年的1亿元发展到2021年的10亿元。电商促进农民年人均增收超过2000元。以此,阿克苏市实现了以人才培养为着力点,对电商产业进行制度优化、品牌建设、基建完善,从而带动整体产业发展的路子,形成了“龙头企业+电商+合作社+农户”的电商模式。

(二)行动者构成——多元主体助力乡村电商产业发展

在阿克苏市农村电商产业发展过程中,行动者构成较为复杂,其中杭州援疆指挥部和阿克苏市政府作为核心行动者的征召与引导在各阶段都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此外,相关行动者同样也在各阶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总体而言,阿克苏电商产业发展涉及的相关主体主要包括:阿克苏市政府、杭州市援疆指挥部、科研院所(杭州师范大学阿里巴巴商学院)、返乡创业人才、当地电商达人、援疆数智企业(主要为阿里巴巴)、物流平台(京东物流、海元物流、顺丰速递等)以及当地企业、当地农户等。除此之外,还包括苹果、香梨、核桃、红枣等农产品核心资源,土地、农资、资金等生产要素。其中,人类行动者在行动者网络中起行为作用,非人类行动者起支撑作用。不同行动者在异质性网络中明确自身定位,并履行相应职能,这是农村产业发展复杂系统得以有效运行的关键。

(三)转译过程——乡村电商产业构建的动力机制

1. 问题呈现:共同强制通行点提出

转译发生前的问题提出是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前提,而将不同行动者的问题及需求汇成一个共同强制通行点,则是构建网络的关键。阿克苏乡村电商产业构建过程中各内外部主体面临众多问题及需求,其中主要是基础设施落后、农产品市场发展受限、电商人才稀缺、物流成本高昂等四个关键问题。但从整体上而言,阿克苏农产品具有较高的质量和产量,且价格低廉、市场潜力巨大,使得阿克苏农产品电商具备较高的潜在市场竞争力。因此,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的现实背景下,通过电商助农促进乡村振兴成为各行动者主体的“强制通行点”。

2. 利益赋予与协商:异质行动者角色界定

利益赋予实际上是资源整合的过程。在这一阶段中,想要实现资源的高效整合,就要以核心行动者为中心,围绕强制通行点,基于各阶段不同行动者的角色内容,进行利益赋予,从而固化各行动者角色。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在阿克苏电商产业发展中,首先需要解决的便是人才问题。2014年3月,作为核心行动者的阿克苏市政府开办了首届电子商务人才培训班,并于2015年1月与杭州师范大学阿里巴巴商学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阿克苏市设立外埠培训基地,开展长期人才培训工作。另外,物流成本是电商发展不可忽视的一环,协调和发展好冷链物流是乡村电商发展的重中之重。一方面通过与京东、海元、顺丰等物流平台签订协议,以有效降低乡村电商物流成本,并扩充各地冷库设施。另一方面与各外部主体进行协商,实现种植端、质保端、产品设计端、物流端、销售终端的联结,实现农户、平台、市场以及各外部主体互利共赢,以建构和激活农产品电商产业链。

3. 征召与动员:核心行动者发挥引导作用

杭州市援疆指挥部和阿克苏市政府作为电商产业发展网络中的两个核心的行动者,主导和统筹各方资源,各行动者得以在行动网络中找到自身定位(图2)。作为协作电商发展的两大核心行动者,杭州市援疆指挥部和阿克苏市政府在不同方面发挥着引导作用。前者以“援”和“助”为主,通过引入电商资源和培养电商储备以提升阿克苏电商产业的发展能力和活力;后者以“引”和“疏”为主,即引入外部企业和组织以及疏导当地企业、人才和农户,尤其是在政策层面大力支持本土电商行业和人才建设,实现了对外部组织、本土产业及农户等人类行动者的征召,以及土地、农产品等非人类行动者的整合与应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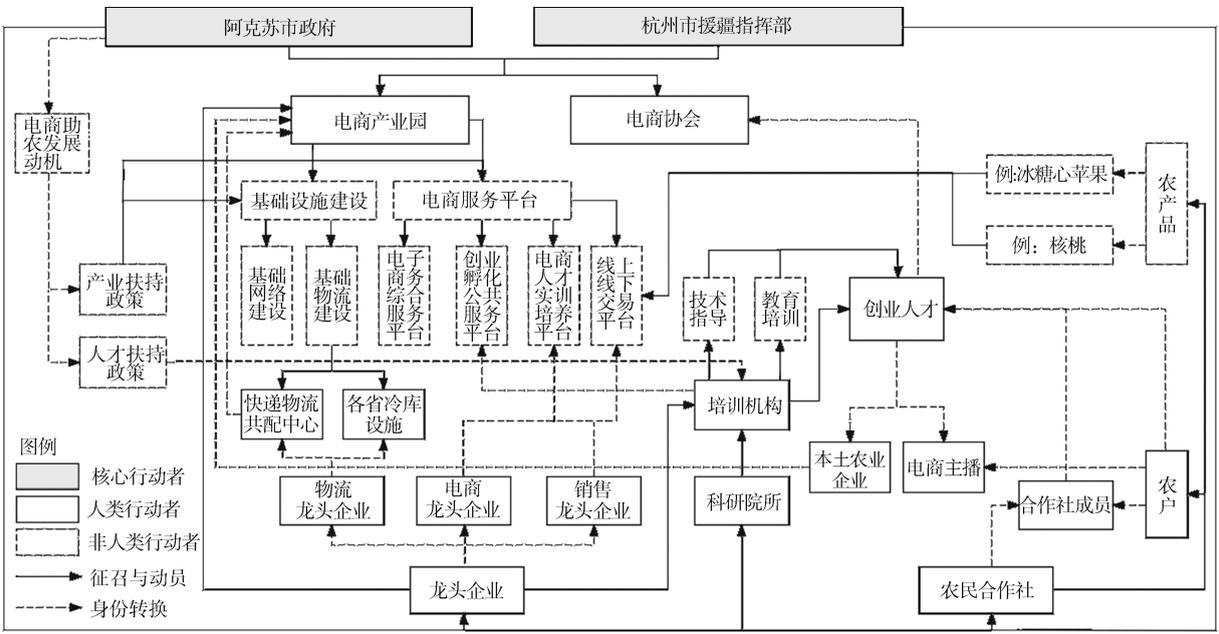


图 2 阿克苏市乡村电商产业发展的行动者网络

四、跨界发展: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促进西部乡村产业发展的实践逻辑

长期以来,西部乡村地区资源要素的缺失与落后极大限制了乡村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升级与转型。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以政治行政体系和宏观调控体制为支撑,通过引入东部发达地区的资源要素,依托外力刺激盘活西部地区资源要素,进而补充西部乡村地区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源要素,以此打通区域壁垒。基于跨区域、跨组织合作,实现资源的跨区域调配,转变了乡村资源要素长期单向输出的困境,同时实现了对东部先进要素的引进,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资源交换”机制,有效促进了西部地区乡村产业发展,带动了就业创业,降低了劳动力和人才外流的趋势。同时,这种“资源交换”使得乡村地区从原本的单向输出转变为与不同合作方之间的双向乃至多向互动,进而加强了不同行动者的直接联系,促进了边界跨越。

不难发现,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背景下的西部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始于政治馈赠的输血行为,并随着政策的推进完善,逐步走向产业发展的造血过程。可以推论,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促进西部乡村电商产业发展的实践逻辑可以体现为,面对多变的市场环境以及过剩的农产品资源,核心行动者依托政策优势和区域间协作帮扶,以利益赋予方式,带动其他行动者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构建跨界发展网络,进而打破组织边界、物理边界、产业边界和地理边界的束缚,构建数字化平台,进而实现电商助农发展和西部当地优势产业发展(图 3)。

(一) 以主体融合实现跨组织边界发展

在过往的研究中,学者们根据供应商、企业以及客户在价值链中的关系,提出了线性关联二元(dyad)和网络协同三元(triad)^①两种模式^[19-20]。然而,就以扶贫为目的的组织间合作而言,虽然这两种模式都能有效实现面向客户的价值,但是组织间合作大多属于“因利而聚、利尽而散”,并且组织间的技术、文化壁垒使得组织合作面临诸多困难,因此,通过单纯依靠

① 线性关联二元模式强调供应商与企业、企业与客户分别构成二元关系并共同形成上下游价值链,而网络协同三元模式强调供应商、企业和客户形成价值网络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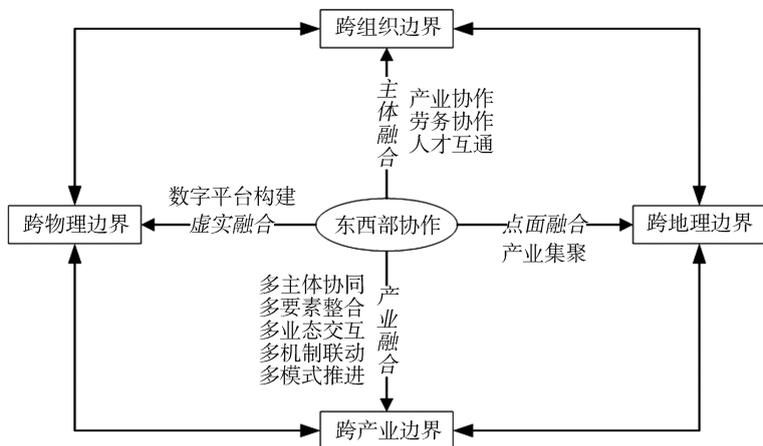


图3 东西部协作助推阿克苏市电商产业发展的实践逻辑

市场机制的扶贫模式不仅效率较低,而且存在时效性隐患,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同理,只依靠国家为中介实现“转移支付”的“强政府”扶贫模式不仅无法建立稳定的双边关系,更限制了两地组织间的进一步合作^[21],因而难以实现组织间的良性互助。因此,考虑到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产业基础,尤其是小农户参与市场交易的能力特征,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通过“有为政府+有效市场”耦合机制突破要素约束^[22],以此跨越组织边界将异质性组织融合起来,从而有效降低组织间的隔阂^[23]。基于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制度建立跨组织边界合作,不仅为原本处于弱势的西部地区提供了平等合作机会,也为东部发达地区借助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制度推动区域间产业融合和消费升级、拓宽区域间劳务合作和人才交流,进而为实现区域间优势互补、互惠互利提供了可能^[24]。

在乡村电商产业发展过程中,涉及的组织不仅包含组织化程度较高的龙头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机关,也包含组织化程度较低的当地企业和小农户,因此,其边界重构往往是从优势组织向弱势组织提供各种生产要素(包括人才、技术、知识)开始的,并进一步实现组织“相对界线”^①的融合和跨越。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之间的组织边界重构是一种带动性的构筑过程,因此,对施援方的组织尤其是核心行动者的征召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涉及的各个组织实际上正是行动者网络中的多元行动者。相较而言,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力量;而科研院校是理论创新的主体,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校企合作是理论与技术和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方式,然而,由于其合作缺乏实践机会,往往流于表面,难以加深二者之间的信任,从而难以实现长期深度合作。在政府政策保证下,乡村电商产业发展作为一种长期实践项目,可以有效加深二者之间的联系,其合作成果以当地企业和农户的实践成果作为表征。因此,乡村电商产业对于组织边界的跨越和融合,实际上是一种不同组织主体相对边界融合的过程。

为解决乡村电商人才储备不足、农村组织化程度低、农产品销售困难、品牌影响力不足等问题,阿克苏市政府和杭州援疆指挥部充分发挥了其作为核心行动者的联结作用,在内,由阿克苏市政府牵头,在杭州市援疆指挥部的帮助下,征召组建阿克苏电商产业园、电商产业协会,完善阿克苏电商产业组织化、区域化、品牌化和标准化建设;在外,由杭州市援疆指挥部牵头,与阿克苏市政府共同引进各龙头企业、科研院所、电商教培机构,在引进技术和知识的同

① 王涛等将合作过程中的组织边界划分为“绝对界线”和“相对界线”,将组织跨界融合体系划分为三个区域:企业内部区域、跨界融合区域和合作方内部区域。其中“绝对边界”是企业不希望被外部影响的边界,可以看作企业活动范围的底线;“相对界线”是企业希望开展对外接触的前沿面,可以看作企业影响力延伸的范围^[25]。

时,实现不同组织边界的融合,构建了一种“龙头企业+电商+合作社+农户”的电商助农模式,从而有效实现了不同组织“相对边界”的叠加交互。而以阿里巴巴商学院为代表的科研院所、“淘员外”等教培机构,通过建立本土培训基地等形式,实现基于地理边界跨越的组织边界跨越,拉近了科研院所与本土组织、农户的距离,同样加深了其与龙头企业间的合作。

可以发现,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推进西部乡村电商产业发展实际上是兼具“政府-市场-社会”多元行动主体合力、多部门组织联动的协作治理模式。通过整合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行动者网络,建立起“有为政府+有效市场+集聚社群”的模式,通过核心行动者即政府机关的征召作用,强化组织间的联系,通过产业集群的形式将组织化程度较低的小农户、本土企业融入电商产业链,与产业链其他主体形成利益共同体,从而实现跨越组织边界的多元主体融合。

(二)以虚实融合实现跨物理边界发展

长期以来,传统农业的环境不确定性、小农生产分散性、品控意识低下以及农产品物流链长、利润薄等结构性问题严重制约着乡村振兴。相对而言,平台经济的聚集效应、网络外部性、资源共享性和跨界融合性等特点^[21],使其成为农产品产业链条各类生产经营服务主体的桥梁,并不断交汇和集聚商品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关键要素^[26]。平台经济、平台组织实现了对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的赋能,缓解了农业生产者长期以来对市场波动和农产品供求信息迅速变化的“无力感”。此外,平台经济同样带动了农业产业组织体系的重组以及产业链条的升级,利用大数据、物联网实现生产过程监管以及云仓储调配,有效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无疑,就数字化协作而言,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面临地区数字鸿沟、西部地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滞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参与数字化市场交易能力有限等困境,要将数字化技术嵌入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实现数据要素与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耦合共振,必须找到有效的突破点。电商平台准入门槛低、见效快,是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参与数字化市场的重要突破点。通过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激活市场机制,实现“自上而下”的农产品电商产业集聚发展,再通过产业集聚发展提升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生产、加工与市场议价方面的能力,进而促进西部地区有效对接电商产品市场。

对阿克苏市而言,数字赋能带来了电商产业链和生态圈的扩张。首先是构建信息互通机制。2018年8月新疆果业挂牌运营,其交易中心共汇聚600余家商户,5000个销售网点,通过实时展现全国各地产品的销售情况,为公司仓储、加工、物流提供数据支持。其次是物流网链的改善。通过建设乡村振兴快递统仓配送中心,在阿克苏商贸物流产业园投资建设产地仓项目,以基于大数据的云仓模式与销地仓在全国各地联动销售阿克苏农产品,有效解决困扰中小电商物流成本高、配送时效差等难题,助推电商物流供应链系统升级,实现供应链系统中各方参与者高质量、高效率、低成本的分工协作,以较低的成本创造更多的价值。最后是提升生产监管水平以及品牌效应。通过建设“未来农场”加装物联网数据采集设备,为土地管理、亩产量以及商品果率提供技术支持,在源头上提高品控管理水平。同时,消费者可以在网上实时看到种植状态,真正实现产地溯源,提升阿克苏苹果的品牌价值。得益于数字化赋能,阿克苏市电商产业有效规避了农业产业的痛点,真正走上产业振兴的快车道。

数字化转型下,农业产业从传统的物理空间扩展到一个新的网络空间^[27]。数字平台及数智企业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通过整合各类生产要素,不断吸收市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使得各低成本信息和资源在虚拟空间迅速流动,带动实体空间产业跃迁,突破物理边界,实现农产品与市场零距离无障碍的精准匹配^[26]。借此,依托数字经济平台的乡村电商产业可以有效实现上下游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互联共通,以此激发相关行动者的活力及发展动力,

从而为乡村电商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具体而言,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构建了一个“产品-市场”对接型的协作模式,实现了线下实体产业、产品与线上虚拟平台的融合。依托东部地区信息平台优势和消费市场优势,提升西部产品品牌效应,打通了西部地区农产品走向东部市场的渠道,不断倒逼提升西部地区农产品生产和供给质量。

(三) 以产业融合实现跨产业边界发展

农村产业融合是资源要素在农村的整合重组,农业产业融合的过程,是基于多主体协同、多要素整合、多业态交互、多机制联动、多模式推进而形成的一种互利关系的过程^[28]。产业边界的消融与重组是农村产业融合的具体体现。而农村产业边界的整体性跨越是农村技术边界、业务边界、运作边界、市场边界跨越的有机结合。然而,农村社会资源禀赋、组织结构碎片化分布、产业关联度较低、空间聚集程度较低,使得大量资源被闲置和浪费。近年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用“连接一切”的方式,使得传统社会大量被闲置的一盘散沙式的资源和各种相关要素被激活、被匹配以及被整合,并大力推动社会资源重组与产业革新,从而实现了产业边界的消融与资源重组^[29]。数字技术为农村产业的主体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以一种“破坏性的方式”为传统产业的技术、业务、运作、市场边界的破壁提供了可能,并以此重构了农村产业结构,有效促进集群化、创新性发展,改变了原有的交易、销售和运营边界。具体而言,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促进乡村电商产业发展,通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市场信息在乡村电商产业发展行动者网络中自由流动,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的市场链条整合。电商平台极大地降低了小微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演化出的分工带动了加工、物流、包装、客服等环节不断延伸产业链、释放大量就业机会,以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联动,形成乡村电商产业集群,以产业集群效应推动乡村产业融合,从而使西部地区有效对接农产品电商要素市场。

本文案例中,阿克苏市政府与杭州援疆指挥部作为核心行动者,通过强政府手段,积极构建有效市场机制,以转变农产品交易形式为转译内容,大力征召外部多元市场主体与本土主体进行有机结合,构建出一条园区化发展的集群式电商模式。为突破技术、业务、运作及市场边界,阿克苏市推动“一园两中心三基地”建设,项目、技术、资金、人才等资源向园区聚集,通过集聚、集约、集中发展,实现电商企业“抱团”发展,提升竞争优势,并借此发挥集聚效应,产生辐射带动作用。例如,针对乡村组织化水平低、碎片化等问题,阿克苏通过征召电商协会、行业组织、战略联盟等性质的合作组织,建立商业联盟,充分发挥组织的实质性作用,促进网商间开展联合采购、合作营销、订单分包等深层次合作,提高集群规模的竞争力。针对企业和农户创业热情低下、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阿克苏充分发挥返乡人员的财富效应和示范效应,加强不同电商群体之间的交流合作,提高同质性资源的利用深度、异质性资源的利用广度,营造开放共赢的电商集群氛围。

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促进乡村电商产业发展,基于农业产业融合实现乡村电商产业跨产业边界发展,通过多主体协同、多要素整合、多业态交互、多机制联动、多模式推进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组织互利过程,实现乡村电商产业技术边界、业务边界、运作边界、市场边界跨越。首先,依靠数字技术激活资源要素,推动市场边界跨越;然后,通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的市场链条,进而带动形成乡村产业集群化发展,提供就业创业机会;最终,实现业务边界和运作边界重组,改变原有的交易、销售和运营边界,实现乡村产业边界重构。

(四) 以点面融合实现跨地理边界发展

农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往往面临众多制约农产品产业振兴“要素落后”的现实问题,诸

如信息流通不畅、地方市场分割严重、农产品流通主体分散、生产决策具有盲目性等^[30]。而产业集群作为世界性的经济现象之一,可以有效解释并解决农产品销售中的诸多难题。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背景下,诸如政府支持、产业基础、平台牵引、资源条件以及市场需求等因素,使得乡村电商产业在发展中产生集聚效应成为一种必然^[31]。反之,产业集聚效应为集群区域带来了更低成本的原材料、劳动力、市场订单等资产性资源,管理知识、生产技术以及行业信息等知识型资源,并营造出更具竞争性和创新的环境氛围^[32]。乡村电商通过集聚化的园区型发展,转变原有的个体经营形式,在基于跨地理边界的网络外部性和集聚内部性的共同作用下,实现了乡村经济的信息共享与资源升级。

对于阿克苏市而言,农业产业组织化程度低、信息闭塞、物流基建不完善是长期困扰农户及本土中小企业的难题。为此,阿克苏市努力发展集聚经济,以集聚经济为着力点,带动改善当地基础设施条件、产业化水平。通过政府权威性,征召内外部多元主体建立阿克苏电商产业园。对内征召本土创业者成立阿克苏电商协会,使得阿克苏电商产业走向集群化、组织化、规范化道路;对外征召各龙头企业,如与阿里巴巴这样的大型数智企业签订协议,在本土设立培训机构,并定期派遣学员前往本部交流学习;协商邮政、顺丰入驻建立快递物流分拣中心,对接洽谈京东物流、海元物流等大型物流综合项目,从而初步形成了集公铁联运、仓储配送、展示交易为一体的商贸物流集散中心。阿克苏市在原有电商产业园的基础上着力升级,形成“电商+物流+合作社”模式,打造现代化电商农产品加工供应产业园,形成阿克苏农产品线上平台的供应链集散中心。

显然,电商集群产业链上的分工合作、同业者间的横向合作以及外部网络组织的合作,使产业集群逐步从相对封闭的产业链体系向相对开放的网络化协同体系跃迁,构建出一个多点突破、点面融合的产业集群协同体系。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通过“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形式,以及强政府的政策环境优势和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优势,形成产业集聚辐射效应。发展外部网络带动内部主体的交流合作,使得农业产业组织化、规范化,从而由细碎式经营演变为紧密的合作联盟,进而有效应对农产品产业振兴的“要素落后”问题。

五、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

本文认为,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需要施受地双方政府和主体部门等核心行动者,以利益赋予的形式,积极征召农户主体、中小企业、边缘产业代表等一般行动者,并以数字载体和现实载体等非人类行动者为纽带,实现产业集群效应,以此缓解农村产业碎片化、组织化程度低等问题,并以共享发展成果、实现东西部协助共赢作为共同愿景,进而构建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的行动者网络。同时,还考虑到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所特有的跨区域特质,引入边界跨越概念,以解释西部地区受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地缘条件、人文环境制约而导致的“要素结构”相对落后的困境,以及相应的跨边界发展出路。故而,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实践逻辑的关键在于跨边界发展网络的构建,即基于特定的政治行政体制框架,依托当地特色资源禀赋,以人才培养为基础,以搭建产业集群化、数字化平台为手段,以龙头企业带动性发展实现边界跨越,突破过往发展中的约束条件,通过主体融合、虚实融合、产业融合以及点面融合的形式,以集群化为支撑、以市场化为核心,实现基本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的两地协作互补。

进一步而言,我国的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主义机制和市场经

济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关键在于西部地区(特别是乡村)要素结构的激活与补齐。换言之,是依靠国家政策导向实现的对西部地区(特别是乡村)的“人”“地”“钱”“技”等核心发展要素的激活与补齐。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又在于两地核心行动者之间的互联共通,构建一种在市场机制之上的“超市场机制关系”。以数智企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组织是城市经济的最活跃行动者,其具体行动往往能带动周边行动者。就农村而言,农户的行为往往受到周边行动者的影响,缺乏一定的自主意识,作为乡村产业发展主力的返乡创业人才、乡贤等行动者的意愿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户的选择。由此,基于政府政策导向牵头实现城市数智企业与农村创业人才合作,进而带动相关行动者合作,成为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的有效手段。而在实现东部地区的先进要素对西部地区资源要素的激活与补齐的同时,相关行动者逐渐建立起深厚的合作关系,从而跳出了简单的“人”“钱”“技”输送模式,以此突破组织之间的边界,构建出一种“超市场机制”的互利互惠模式,从而实现由“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向“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的转变。

(二) 政策启示

无论是东西部协作抑或是对口支援,其实质在于依托体制优势,推动东部地区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参与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资源互补,帮助西部地区破解要素缺失和经济落后的难题。不难看出,杭-阿协作以“跨边界发展”为表征,补齐了阿克苏乡村产业发展的诸多要素短板,这对其他西部欠发达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政策和实践启示:

1. 打通产业合作上下游产业链,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产业园区是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 and 转型升级的重要空间聚集形式,是联结产业协作双方资源流动、优化资源配置的良好载体^[33]。一方面,建立东西部协作产业园区和产业协会,为东西部协作的具体执行过程提供了一个组织间协作的缓冲平台,同时,使得西部地区的企业及相关从业者形成“抱团”优势,提升自身在产业链中的议价能力和组织化水平,进而充分发挥西部欠发达地区区位、资源、劳动力优势,吸引东部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禀赋的跨区域流入。另一方面,产业协作助推欠发达地区的农业产业从单一的种养环节向产销全产业链条转变。此外,数字技术的赋能降低了上下游产业链的互通门槛,便利产业园区的搭建和上下游产业之间的协作互通,进而推动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2. 搭建产业联动协作平台,构建东西部协作常态化、规范化机制

东西部协作的具体执行过程是在以中央政府、施受双方政府及相关行动者的互动中实现的,其实际的互动关系直接影响着协作工作的成效,因此,必须在协作中基于双向反馈,对实际的协作过程进行不断调整,进而完善东西部协作机制的常态化构建,促进东西部协作常态化、规范化。通过突破空间限制,根据协作要求,建立东西部协作横向联动平台,实现协作双方“人”“地”“钱”“技”等要素的自由互动和高效汇聚,形成跨区域协作治理范式,降低协作双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目标偏好、价值取向和行动取向产生的异质性,优化协作流程,进而为双方进一步深入交流协作提供有利条件。

3. 厘清东西部协作中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引导东西部协作适度组织化转型

良性的互动式治理,亟需国家、市场与社会三大主体相互嵌入和协作共治^[34]。东西部协作的实践过程存在显著的“利益非对称性”,即中央政府、支援政府和受援政府之间的利益不平衡问题^[35]。这一问题的长期存在无疑会影响东西部协作制度的平稳运行和长效发展,因此,东西部协作要进行适度组织化转型,即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参与”的方式,实现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36]。逐步引导东西部协作由国家主导向国家

引导转变,强化市场和社会主体在协作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推动产业深度合作、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引导社会力量有效嵌入。

参考文献:

- [1]方珂,蒋卓余.东西协作扶贫的制度特点与关键问题[J].学习与实践,2018(10):105-113.
- [2]王小林,谢妮芸.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从贫困治理走向共同富裕[J].探索与争鸣,2022(3):148-159.
- [3]方方.东西部产业扶贫协作的路径与机制研究——以北京对口帮扶河北为例[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5(1):14-20.
- [4]谢治菊,陈香凝.东西部协作项目制:运行逻辑、实践困境与治理路径[J].社会科学研究,2023(1):94-103.
- [5]马超峰,肖龙.条块结对: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经验阐释[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1):78-87.
- [6]梁琴.论中国特色的结对治理:以东西部协作为例[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2):16-27.
- [7]李小云.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的四维考量[J].改革,2017(8):61-64.
- [8]王禹瀚.中国特色对口支援机制:成就、经验与价值[J].管理世界,2022,38(6):71-85.
- [9]李瑞昌.界定“中国特点的对口支援”:一种政治性馈赠解释[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4):194-204.
- [10]Callon M.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J].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1984, 32(S1): 196-233.
- [11]郭明哲.行动者网络理论(ANT)[D].上海:复旦大学,2008.
- [12]Callon M, Latour B. Unscrewing the Big Leviathan: How Do Actors Macrostructure Reality, and How Sociologists Help Them to Do So[M]//Knorr K, Cicourel A. Advances in Soci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Londres: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1: 277-303.
- [13]Carlile P R. A Pragmatic View of Knowledge and Boundaries: Boundary Objects in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2, 13(4): 442-455.
- [14]姚奇富,朱正浩.从“陌路人”到“深度合作者”:基于组织“边界跨越”的产学研合作路径探索[J].教育发展研究,2021,41(19):52-60.
- [15]Tallman S, Jenkins M, Henry N, et al. Knowledge, Cluster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4, 29(2): 258-271.
- [16]Schoonhoven C B. Evolution of the Special Issue on Knowledge, Knowing, and Organizations[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2, 13(3): 223-224.
- [17]肖静华.企业跨体系数字化转型与管理适应性变革[J].改革,2020(4):37-49.
- [18]肖旭,戚聿东.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维度与理论逻辑[J].改革,2019(8):61-70.
- [19]Choi T Y, Wu Z H. Taking the Leap from Dyads to Triads: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 in Supply Networks [J]. Journal of Purchasing and Supply Management, 2009, 15(4): 263-266.
- [20]Wynstra F, Spring M, Schoenherr T. Service Triads: A Research Agenda for Buyer-Supplier-Customer Triads in Business Services[J].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15, 35(1): 1-20.
- [21]王娜,马尹岚.平台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探源与路径重构[J].学习与探索,2023(1):153-158.
- [22]熊雪,聂凤英,朱海波.西部脱贫地区小农户如何有效对接农产品电商市场——基于有限能力视角的重庆市秀山县案例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23(4):68-89.
- [23]Grönroos C, Voima P. Critical Service Logic: Making Sense of Value Creation and Co-creation[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013, 41(2): 133-150.
- [24]廖成中,毛磊,翟坤周.共同富裕导向下东西部协作赋能乡村振兴:机理、模式与策略[J].改革,2022(10):91-105.

- [25] 王涛, 陈金亮, 战梦霞. 组织边界的“双刃剑”效应及其化解——基于跨界团队的视角[J]. 财经问题研究, 2021(12): 112-122.
- [26] 吴彬, 徐旭初, 徐菁. 跨边界发展网络: 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振兴的实现逻辑——基于甘肃省临洮县的案例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22, 43(12): 59-72.
- [27] 张兴旺, 孟丽, 杜绍明, 等. 关于信息化影响农业市场化问题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19, 40(4): 39-45.
- [28] 傅琳琳, 黄祖辉, 朋文欢. 农村产业融合经营主体“互利共生”的机理与推进路径[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2(6): 69-77.
- [29] 王卉, 胡娟. 跨界整合: 互联网环境下传统内容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J]. 中国出版, 2016(19): 19-22.
- [30] 曾亿武. 农产品淘宝村集群的形成及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以江苏沭阳为例[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8.
- [31] 李音韵.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中的集聚效应分析[J]. 环球市场, 2018(27): 162.
- [32] 戴潇. 产业集群集聚效应、创业网络与创业绩效关系研究——以陕西省农村电商产业集群为例[D]. 杨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8.
- [33] 左婷, 刘文婧, 于乐荣. 乡村振兴目标下东西部协作的再定位与发展创新[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5): 11-20.
- [34] 顾昕. 走向互动式治理: 国家治理体系创新中“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变革[J]. 学术月刊, 2019, 51(1): 77-86.
- [35] 谢治菊, 彭智邦. 东西部协作政策扩散的维度、逻辑与启示——基于政策扩散理论的文本分析[J]. 中国公共政策评论, 2021, 20(3): 37-56.
- [36] 谢治菊, 陈香凝. 从个体流动到组织推拉: 劳务协作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以SN东西部协作为例[J]. 广东社会科学, 2024(2): 40-53.

(责任编辑: 宋雪飞)

How is East-west Collaboration and Targeted Assistance Made Possible? Cas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Industry in Aksu City, Xinjiang

XU Xuchu GUO Huixin WU Bin

Abstract: East-west collaboration and pairing assistance are pivotal strategies for address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imbalances in China. This paper employs a case study of Hangzhou city's efforts to foster the e-commerce industry in Aksu, Xinjiang, and constructs a framework for cross-boundary development networks based on actor-network theory. The aim is to investigate the implementation logic of east-west collaboration and pairing assistance within the digital economy context.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logic of implementation for east-west collaboration and pairing assistance is demonstrated in the creation of a cross-border development network. This involves integrating entities, merging virtual and physical elements, aligning industries, and transitioning from points to areas. By breaking through the barriers of organizational, physical, industrial, and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this approach achieves a positive synergy between the supporting and recipient regions, thereby further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ompetitive industries.

Keywords: East-west Collaboration; Pairing Assistance; Cross-border Development Network; Rural E-commerce